

甲骨文“史”字考释与史学起源

关万维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广东 深圳 518028)

摘要:甲骨文“史”字中的“丨”形代表的利刃不是兵器而是刻骨工具,是殷商时代占卜活动中的记录者:卜卦问天,史刻于龟。但“史”有六种职能,捉刀刻龟的更具体地说是史官中的“尹”。“尹”是将卜人占卜的结果刻到骨头或龟板上的直接操刀者。“尹”是诸“史”中地位最高的,因此后来蜕变成为职权更高的官职。如果说殷商王室对占卜内容的记录是古代史学不自觉的开始,那么西周王室对“史”的重视则基本奠定了古代史学的开端。从商至西周,“史”不但更职业化也更自觉化完成从职务到史学意识的转变,开启了官吏传统。东周时期各国的史书,更是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思想、文化确立的方式和内容。

关键词:卜;史;巫;史学起源

中图分类号:K 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6)03-0143-05

先秦诸子评论时政往往必称“先王之教”,“先王”成为一种重要价值参照,对“先王”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思想家的政治立场。而儒家和法家对待先王之教的态度则是基本对立的:儒家往往通过肯定“先王之教”来批评当世君主以表达其治国安邦的政治诉求;而法家则通过质疑“先王之教”来强调改革的必要性,否定先王之教的现实意义。因此,“先王之教”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儒家和法家之间的政治价值观的重要参照。

“先王之教”的载体是什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政治实践中对历代政治经验的各自阐述;一方面是以六经为主的稍晚形成的典籍。《庄子·天运》最早提出六经乃先王之迹:“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虽然其原意略带贬义,意为陈迹不可踪,但客观上阐明了六经与历代政治的关系,因此从《庄子》到王通再到章学诚等,均认为“六经皆史也”。由此可知史学是先秦政治思想的核心材料之一,史学对古代思想的生成与影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古代思想直接扎根于历史经验升华蜕变而来。“先王之教”是如何一种状况?“自有天地,而至唐虞

夏商,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1](P121)}先王之教,主要问题就是“穷变通久之理”,史学将早期政治思想以典籍的方式,直接对思想、文化类型的形成起到关键性作用。对中国文化至关重要的史学起源于何时何事?有学者如李泽厚等认为“由巫而史”,是否如此?以下先从甲骨文“史”字的形义再考释,追溯古代史学的滥觞肇始。

一、巫、卜与史

目前最早的自成体系的文献材料当为殷墟卜辞。卜辞有“史”字,是否因此断定中国史学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商?甲骨文中的“史”,是最早的“史”字吗?张舜徽认为,至迟在夏代,我国已经有了文字,只不过是还没有被发现。因为从甲骨文字的形体结构来看,比较繁杂的形声字也出现了不少,而按文字发展规律来说,说明在商代以前,早已经历了一段较长期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少则几百年,多则上千年^[2]。不论张舜徽先生的推论是否正确,目前发现的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只是一些形象的刻画,未能构成一个

收稿日期:2015-11-10

作者简介:关万维,历史学博士,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和思想史研究。

相对完整的表达体系,因此甲骨文的“史”应该是目前最早的。

《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从文献的记载看,商代也已经有了文献的相应载体。所谓“册典”是何物?是否就是这些记载着商王活动的卜辞?一次占卜,是行巫问天;千次问卦,可以构成一套档案文本,这就是历史。卜辞内容涵盖商王室生活政治的多方面,据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统计,卜辞内容“大别为六”:(1)祭祀:对祖先与自然神祇的祭祀与求告等。(2)天象:风、雨、霁、水及天变等。(3)年成:年成与农业等。(4)征伐:对外战争与边鄙的侵犯等。(5)王事:王之猎田、游止、疾、梦、生子等;(6)卜旬:来旬今夕的卜问^[1](P138)。这六个方面的内容,显然涵盖了王室几乎所有的重要活动,因此,占卜的遗存就是记录商王室活动的一手资料,就是商王朝史。卜辞不仅仅是占卜的记载,也是一种“实录”,是较为原始的史学形态。陈梦家云:“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卜辞中常有王卜王贞之辞,乃是王亲自卜问。”^[4]《诗·长发》云:“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唯阿衡,实左右商王。”阿衡即伊尹,地位高如伊尹者有明确的行卜记载,因此陈梦家认为商代巫的地位很高,而商王是百巫之长;张光直也主张殷商文化的特质为巫文化^[5](P59);而李零认为,巫与卜不是一回事,巫自殷商以来地位很低。巫对占卜之事可能参加,但所谓“贞人”是“卜”不是“巫”^[6](P173)。王亲卜,只能说明王亦善于此道而并不能说明王即巫。商王朝政治架构已经很成熟,世俗权力应该早就脱离相对蒙昧的巫神权力模式。从很多人类学调查报告看,只有非常原始的部落才王权神权不分,而相对成熟的原始部落里酋长基本上已经脱离巫觋身份。从《尚书·盘庚》等材料看,商代王政已经非常成熟,商王不太可能还停留在蒙昧的神权时代,即使商王掌握卜的技术也不可能是巫的身份。

巫与卜也是两种不应混淆的身份。《甲骨文合集》第6007条记载:“辛卯卜,壳,贞刖。”(参考译文:辛卯日占卜,贞人壳问卦,要实施刖刑吗?)《合集》第6001条记载:“丁卯卜,壳,贞刖,若。”(参考译文:丁卯日占卜,贞人壳问卦,实施刖刑会顺利吗?)从这两条卜辞看,占卜者是有署名权的。而卜辞出现占卜者常见三种情况:王、占卜师、不署名。上述的“壳”就是一位比较常见的占卜师。陈梦家《综述》云:“廪辛和其它早期卜辞都有卜人,康定、武乙、文定没有卜人(除了武乙卜旬之辞有卜人历数见)”^[1](P178)。王亲自占卜,显然是要书写进来的,但为什么占卜师有的书,

有的不书?陈梦家认为卜师中还有卜官,相当于《周礼》中的大卜、卜师、龟人等,他们和命龟者的“卜人”不同^[1](P156)。陈梦家发现相关联的宾组卜人多达15人,而少见又附属于此组的卜人达二十多人^[6]。卜辞中有这些具体身份的职业占卜师的存在,但并未见到“巫”与“卜”并存。即使卜与巫之间也可能存在某些身份重合的个案,但因为巫和卜均与神秘文化有关而混淆两种身份。

二、甲骨文“史”、“尹”字义再考

“卜”不是“巫”,而是一种直接为王室服务的职业,那么“史”是什么?陈梦家称,卜辞中所见官名约二十多种,它们和西周及其后的官名都有联系,但不尽相同。陈梦家将殷官分为三大类:臣正、武官、史官。史官又分为六种:一是尹类如尹、多尹等,二是乍册,三是卜类如卜某、多卜,四是工类如工、多工等,五是史类如史、北史、卿史等,六是吏类如大吏、我吏、上吏等^[1](P58)。在《合集》第7412、第7417、第7418、第28089正等卜辞中均有“册”字。因此,陈梦家“则殷代已经有竹木简的书册,大约是不成问题的”的推断是大致可信的,可见“史”的工作之一是“乍册”,即装订文档(不一定是木简),但是尹、多尹、卜、多卜、工、多工等职业也归属为“史”,或许说明“史”这一工作由多个工种协作完成,在这个意义上,“史”好比一个部门。

“前巫后史”或者“左巫右史”,可见“史”也不是“巫”。不妨从甲骨文“史”字看它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信息。《说文解字》关于“史”的解释是:“史者,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许慎的解释现在看来显然受到后来历史学的观念影响,对“史家直笔”等晚出观念的附会比较明显。徐复观认为:“由许慎至王国维,皆以后世史的职务来推释史字的形义,而忽视了史的原始职务,是与‘祝’同一性质,本所以事神的,亦即原系从事于宗教活动的。其他各种的‘记事’职务,都是关联着宗教,或由宗教衍变而来。”^[7]徐复观指出“史”有其原始职务这一含义显然是非常正确的,也意识到“史”与宗教活动关联,但未能将其中的缘由揭示出来。徐复观注意到早期“史”的职业含义和宗教含义,可能是从较晚的文献记载如“前巫后史”等信息中来。

《甲骨文字诂林》第2933条关于“事、史、吏”三字的解释,总共超过14页。诸家的解释中,胡厚宣、徐中舒、伍士谦等认为“史”字型含有干戈之义。又如

方述鑫云:“今按甲骨文史中之口,当和干、单一样是武器,其中‘丨’像木棍,口像捆在木棍上的石块。”方述鑫虽因形而释为“像捆绑在木棍上的石块”,但也认为是“干”、“单”一样的武器。马叙伦认为“其实史为书初文聿之异文……聿、史虽有悬正之殊,皆是笔之初文”,《甲骨文字诂林》编者按语则认为,马叙伦此为“纯属想象之辞”^[9](P503-522)。但其释“古之书刀即笔也”,却亦是异曲同工。

多位前贤均认为“史”甲骨文字“中”字形含兵刃之义,但是“史”显然不会是从军事活动的人。那么手持兵刃而不战者何人?这是理解“史”的本义的关键。从甲骨文成形方式来看,这种手执刃而不战的,应该就是刻卜于龟的操刀手,也可以理解成“卜”的助手。简而言之,卜卦问天,史刻于龟,也就是说,甲骨文中的“史”应该是将卜人占卜的结果刻到骨头或龟板上的那位“操刀者”。由此看古代撰文执笔者也称“操刀者”并非妄辞。古代占龟之术,殷商之后依旧延续许久,“由盛而衰,汉代似乎是关键时期”^[10],因此,捉刀刻龟一事应该也是延续很久,故而有“捉刀”一词,只不过在占龟之事消亡之后,这个词虽然继续使用,但因为刻龟之事已无,“捉刀”的语源因此无人知晓。

既然卜辞中的“史”指的是捉刀刻龟者或是将占卜结果记录下来的人,也就是很可能这个“史”是“卜”的助手,或者是跟“卜”并列的另一种职业,很可能也是最早识文刻字的人,从事文字记录的人。这是已知最早的“史”,与后代的“历史”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并不是自觉意义上的“史”者,而是纯粹的“识字手民”。如果说这就是商代的史官,那么这个“史官”只是一个操刀手。但因为“史”是最早的识字者,至少大量的甲骨文献记录由他们来完成。殷商王室的占卜活动及其结果,经由识字的“史”之手保存下来了,完成了远古时代规模庞大的一份文字档案的生成。从完成了特定史事的记录这一事实来说,操刀者“史”,其实已经具备了后来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中的“史”的含义,殷商时代的这些占卜活动中的操刀者,可以说就是最早从事史学活动的人。

我们再来看“史”部门中六种工种的分工。乍册是装订文献的,那么在乍册之前的“尹”或者“多尹”呢?《说文解字》关于尹字的基本解释是“治也,握事者”。孙海波认为“甲骨金文从又持丨,丨象笔形周制内史之职而尹氏为其长,其职在书王命与制禄命官,故字从笔。”而李孝定认为,尹字“殆象以手执笔之形,盖官尹治事必秉簿书”^[11](P191),李孝定解尹字为

手执笔形,这是正确的;但释为官尹治事秉簿书,则是受到晚出字义的影响。联系“史”这一部门的六种职能可知,在史职中捉刀刻龟的更具体地说是“尹”,“尹”刻龟骨,而“乍册”则装订文献。“尹”是诸“史”中地位最高的,因此后来蜕变成为职权更高的官职,“尹”字于是逐渐演变出新的含义如“治也,握事者”等等,而“史”则固守着原来的职业特点。

当然,殷商的史官中最高地位者“尹”只是“刀民”,他们的劳动并非出于“史”的自觉,而是行政事务。但不管“史”的地位如何,职业色彩如何,作为商代官方政治活动——占卜的记录者,“刀民”们完成了一个时代的档案文献的生成工作,谁也不能否定这工作的“史”的价值,只不过是这样的“史”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史识”。商代是否有其他形式的“史”,目前不得而知。即使如此卜辞的“史”的价值都是无可估量的。殷商的占卜活动,通过史官的龟刻,客观上形成了早期的史学材料,操刀手完成了古代中国最早一批文字材料的生成,完成了已知最早的史学文献的生成,这些操刀者堪称中国最早的史家,无意间成为史学起源的参与者,这或许就是中国史学的滥觞,也开启了历代王室重视史事记载从而形成官史传统的先河。

三、史学的滥觞与思想史肇始

如果说殷商王室对占卜内容的记录是古代史学不自觉的开始,那么西周王室对“史”的重视则基本奠定了古代史学的开端。如果说殷商时代“史”只是占卜的一种组成部分,那么完全职业化的史官,在西周时代已经是必不可少的。而东周时期各国的史书,更是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思想、文化确立的方式和内容。

内史尹册命楚赤□布。

——《楚簋》

这是周王使唤、命令史官的确切记载,《毛公鼎》铭文中“大史寮”,这也是一个职业化史官。《殷周金文集成》所收金文中出现“史”字多次。因此,专职化、职业化史官虽然不能直接上溯殷商,但是从西周开始,史官职业化却是有明确记载了。

(武王有疾)史乃册祝曰……

——《尚书·金縢》

《金縢》是《尚书》中纪事较为有趣的一篇。《金縢》的真伪问题在宋代开始有学者提出怀疑,以为其中所讲鬼神之事与周公圣德不符,而近代以来倾向

于肯定其真实性^[9]。《金縢》详细记载,武王克殷后两年身罹重疾,周公作策书告神,请代武王死。具体的操作,由“史”操办。可见早在周初,“史”的身份就非常明确了。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
于君。”
——《左传·文公十三年》

春秋时期“史”对于“卜”的取代是一脉相承。邾文公问卦,由“史”而非由“卜”来完成,可见“史”在春秋时期已经从一个捉刀手变成占卜的操作者。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卜”和“史”两种职业发生合并,一方面也可能是“史”的身份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西周以来“史”的职业色彩已非常固定和突出,这些朝廷中最识字的人一边从事官方文档记录,也因为掌握占卜术而从事占卜事务,而职能单一的卜人逐渐被淘汰。

有些学者认为,“巫”与“史”之间存在着一个由“巫”而“史”的过程,持此观点的如李泽厚^[10]。但李零认为“巫”与“卜”不是一回事,本文前面的考证也想说明“史”与“卜”还是“巫”都是不能混淆的。不管史事中的个别案例是否可能出现过“巫”与“史”或“卜”身份上的重叠,但是将巫与史混淆或者认为存在由“巫”而“史”这样一种递进变化,恐怕都是欠妥的。而西周时期的“史”,其职能则更加明朗化,西周的“史”除了记录一些官方文档,也担任着“卜”的职能,专职的“卜”或已经退出主流社会。从甲骨文“史”字的考论表明操刀者为“史”,与“巫”或“卜”并存,因此以为“史”起源于“巫”的观点显然是不可靠的:一个在乎神判,一个在乎纪事;一个在乎感天地,一个在乎观眼前,职业性质迥然而异。史巫含混不清的观念或当抛弃;商代史、巫合作,周代前巫后史,二者职能已经出现差异了。

既然西周有职业史官,“史”的职能已经具备。刻龟的习惯,演化成记录王室大事的习惯,“史”于是与后来历史学意义上的“史”更接近了。商代甲骨文出了卜辞以外,也发现了一些其他类型的文献,因此甚至我们可以适当推论,商代“史”的职能也并非单纯的记录占卜结论的职能。虽然目前发现的商代甲文全部都是卜辞,但并不能绝对排除卜辞之外商人不再有其他内容的记录,很难想象甲骨文如此成熟的文字,仅仅为了记录占卜之用。商代其他形式的书写,如1977年在殷墟小屯北地出土朱书玉戈一件。戈体上边有朱书七字^[11]。虽然数量极少,却把书写的历史上溯到三千年前,商代可知的记录方式也多元化了。

周人炼金为鼎,铸鼎纪事。从金文的内容来看,凡大事、大功、王命,往往做一吉金为铭,刻辞以扬王法成命,以显赫王命之尊,以记身世之威,以佑子子孙孙永保用。铸一吉金为纪一事,铸百千吉金便成史。周史记王室之事而成为史,以此作为起点的中国古代史学,自然就有官史色彩。近代学者反思传统史学,将之蔑称为官史,并以近代西方史学的多样性来作为批判传统史学的参照,用两百年以来形成的西方史学观作为标准去批判三千年的中国史学,这只能说是对传统文化反思过程矫枉过正。

因为西周以来官史的存在,因此孔子便有《书》可读,有《春秋》可删。这对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品格的推进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孔子的读本只可能来自西周盛世和春秋中早期,春秋各大国均做国史,蔚为大观,他们的源头当然是西周王室的一种文化习惯。从今文《尚书》的文辞来看,不乏跟金文颇为接近的。二者的区别则在于一个是西周文献原型,一个经过后世传写。传写过程中可能包括字形、字义、句法等随着时代变迁而引起的讹异等,但是大体上保留着几分神采。根据各国史书,“夫儒之职业,诵法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12](P1035),儒学或其他学派于是逐渐在官史的基础上形成,古代史学对于思想史的决定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西周、春秋有官史,而战国则开始出现有私史色彩的著作。如果《春秋》是官史,那么《左传》就有一定的私史色彩。《左传》不知为何人所作,虽然来自多人手笔,但一部分内容与孔子思想十分接近,接近于孔子的《春秋》教本。《左传·昭公十七年》云:“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周王室的史官之职,是否上承于殷商不得而知,影响到诸侯各国却是事实。《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战国乱世,依然有史官。就连来自西戎之地的秦,也有官史,只不过其官史过于简陋。以前以为秦史没有编年,但从睡虎地秦简的相关文档看,秦史也是有编年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转述司马谈语:“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司马谈所言或有失实之处,但可信战国史官地位降低、官修史书不如春秋时期详实应当可信。

官史将君主政治行为或日常行为上升为文化内容,当然也有如《诗经》者,既有来自上层社会的咏叹,也有来自下层士人的声音;《礼仪》则是从上到下

均可各自得到适用内容的行为规范。这一切都依赖“史”以保存下来。“史”几乎从文明自觉时期起就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基础和重要部分。看巫、史、卜三种职业:巫通鬼神,主持神判;卜则以天意主人事;史是将卜的内容刻于龟壳牛骨上的操刀手。“卜”完成了问天的工作,“史”负责将这个过程和结果记录下来。“史”完成了中国文化第一批档案记录的完成,可谓不辱“史”命。《礼记·礼运》云:“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随着西周思想中人文主义色彩的日趋成熟,周王室对神的依赖较殷商王室大幅度降低,巫角色的重要性大幅减弱,卜的职能也逐步融入“史”中。官史文化的进一步成熟,使得《尚书》、《诗经》等早期文献应运而生,这些都是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作为古代思想史核心的儒学,对于史学的倚重更是极为突出的。需要再次指出的是,并不能因为“史”的早期活动形式与占卜的密切相关而认为中国史学起源于占卜。史,作为远古社会最识字的阶层,殷商时代不自觉的史学工作者,两周时代自觉的职业史家,他

们地位或许并不高,他们的职业工作所生成的成果并不能体现出个人人格或情怀,却奠定了中国史学最初的基石。

参考文献:

- [1] 章学诚,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 张舜徽.广文字蒙求[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0.
- [3]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4]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J].燕京学报,1936,(20):535.
- [5] 李零.中国方术续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6]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M].北京:三联书店,1996.362.
- [7]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3卷)[M].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79.220.
- [8]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M].北京:中华书局,1996.2961.
- [9] 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408.
- [10] 李泽厚.己卯五说[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44-51.
- [11] 胡厚宣等.殷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39.

【责任编辑:周琍】

The Interpretation of “史” on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Tortoise Shells or Bones

GUAN Wan-wei

(Shenzhe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Shenzhen, Guangdong, 518028)

Abstract: The sharp blade represented by “丨” in the character “史” on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tortoise shells or bones is not a weapon but an engraving tool, an recorder of the divination in Ying and Shang period: asking the Heaven by divination, and oracles were engraved on tortoise shells by historians. But “史(historian)” has six functions. To be more specific, those who engraved the oracles on bones or tortoise shells were historians called “尹(yin)”. They were the historians of the highest position, and thus later turned into high-ranking officials. The royal family in Ying and Shang period might have begun to record divination unconsciously, whereas the royal family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史(recording history)”, which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the ancient historiography. From Shang Dynasty to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historians” became increasingly professional and conscious. They transformed from historians of high position to historians of historiography consciousness, which began the tradition of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the historical books of all the states had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tent of later ideology and culture.

Key words: divination; history; witchcraft; historical origin